日本侵华的“舆论战”

■许　华

继前年出版25卷本大型图册《日本侵华图志》之后,在“七·七事变”80周年之际,山东画报出版社又隆重推出10卷本四色精装印制的大型图册《日本侵华战争自供状:中国事变画报》。

《中国事变画报》(原名曾为《北支事变画报》和《支那事变画报》)从1937年8月创刊到1941年底停刊,其唯一任务就是报道日军侵华战争。由日本大阪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特派随军记者拍摄、采写的战地新闻及大量图片,都被刊发。这个在当时日本军队和日伪上层人士中发行量最大、知名度最高的画报,堪称为一部深入反映日军全面侵华战争历史的全景式记录,为我们深入研究日本侵华战争历史提供了大量佐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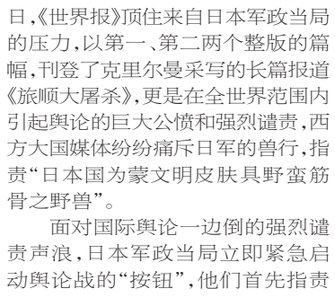
概言之,该刊是当时日本军政当局用心良苦的重要“宣传工具”。比如该画报刊登有所谓上海市民整齐夹道列队“欢迎”日本占领军的照片,还刊登有所谓“兴高采烈地迎接日军警备队的五台山僧侣与住民”的照片,更刊登有不少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尽显温馨“和谐”的生产生活场景等类似照片。这些图片尽管是拍摄于当时当地,但显然是一种精心的“摆拍”,与当时中国广大民众对日本侵略军切齿仇视的普遍心态是完全相反的。

当代军事理论在对现代战争形态变化及其特点规律进行深入探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三战”的新概念,即:旨在获取发动战争法理依据的“法律战”;旨在控制媒体以提高国际媒体和国内民众支持率的“舆论战”;旨在多方摧毁敌方抵抗意志的“心理战”。

其实,以新闻媒体为支撑的舆论战历史已经很久。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军政当局就曾打出过舆论战的“好牌”。是年11月22日,日军攻占中国辽东半岛战略重镇旅顺口,随即对当地和平居民进行惨绝人寰的疯狂大屠杀,在短短4天时间里有2万多中国民众惨死于日军的刀枪之下。12月6日,美国纽约《世界报》记者克里尔曼率先向外界讲述了他在旅顺亲眼目睹的日军“旅顺大屠杀”事件;12日,《世界报》发表克里尔曼撰写的短篇通讯《日军大屠杀》;13日,《世界报》发表题为《日军的残虐行为》的社论,立即引起美国及西方各国公众的广泛关注;20日,《世界报》顶住来自日本军政当局的压力,以第一、第二两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克里尔曼采写的长篇报道《旅顺大屠杀》,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舆论的巨大公愤和强烈谴责,西方大国媒体纷纷痛斥日军的兽行,指责“日本国为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之野兽”。

面对国际舆论一边倒的强烈谴责声浪,日本军政当局立即紧急启动舆论战的“按钮”,他们首先指责西方媒体报道失实,邀请美国驻日本公使赴旅顺进行现场调查,并表示即便发生了屠杀事件,也是日军对中国军队屠杀日军战俘的一种报复。日本媒体也迅速开足机器,连篇累牍地大肆宣扬日军是“仁义之师”,反诬清朝军队异常残暴,诱导国际舆论渐趋和缓。后来在1895年2月攻陷威海卫和刘公岛时,日军特意邀请西方记者组团去现场观看他们对清军伤残战俘提供医疗救治服务后予以释放,并在众多西方记者面前全程展示他们将自杀殉国的中国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等高级将领灵柩精心“礼送”出刘公岛铁码头的整个过程,从而在西方媒体面前使日本成功扮演并骗取了“文明国家”的良好形象。

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在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更是一直开足媒体机器,为其野蛮残暴的侵略行径“护航”。这套10卷本《日本侵华战争自供状:中国事变画报》在中国出版发行,将为我们深入研究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各种罪行,提供最直接、最生动的原始佐证。我相信,有心的读者和史学工作者们,一定能够从这套大型图册的13000多幅图片及其160多万字的释文中,挖掘出当年日本侵略者为其侵华战争而进行舆论战的更多铁证。



《日本侵华战争自供状:中国事变画报》,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编,李继锋、雷国山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7年6月第一版,8600.00元

不息哲思入新帙

——中华书局《张岱年全集(增订版)》简介

■邹　旭

经过两年多紧锣密鼓的工作,增订版《张岱年全集》第一辑已于日前面世,包括了张岱年先生最具代表性的四部著作,即《中国哲学大纲》《天人五论》《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

清华大学出版社曾于1989至1995年陆续出版《张岱年文集》六卷本,而后河北人民出版社又于1996年出版《张岱年全集》八卷本,惜因当时种种条件所限,《文集》《全集》对张先生作品收录未周,尚有遗珠之憾。2014年,经张先生家属的授权与协助,中华书局开始对张岱年先生著作重新进行全面收集整理,计划用几年时间分批出版《张岱年全集(增订版)》,以冀形成张先生全部著作的一个完整版本。

现将新版《全集》概况及编辑过程中所做的主要工作略做介绍,以供学界和读者了解。

一、增补。增订版《全集》在《文集》《全集》的基础上,通过家属提供和社会征集,将整理收录张先生大量未曾面世的手稿,包括学术论文(以1949年以前及晚年为主)、随笔札记、授课讲义、书信、日记、译著等,以及若干已发表而原版《全集》未收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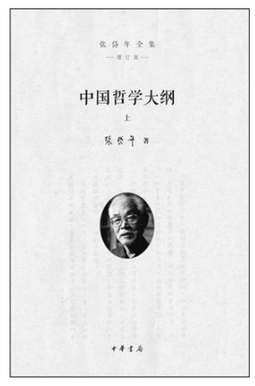
其中,有一些内容此前从未面世。比如:张先生几十年来思有所得随手记录的札记卡片纸条,家藏有几箱之多,此次按年代及内容分类整理,拟题为《张岱年研思札记》;张先生与学人、亲友往还书信家中多留有底稿,又得四川师范大学黄开国老师等热心提供珍藏信件,拟结为一集出版;张先生素有写日记的习惯,家中存留多本,时间纵贯几十年,所记既有思想心得,亦包括日常交游,有极珍贵的思想与史料价值,相应文字亦将裒为一册。

二、新编。增订版《全集》大体上分为专著、论文、杂著三大类,各书均尽可能以张先生手订原貌呈现。其中,论文部分以张先生自编之诸选集为纲,而将相应年代的零篇文章附于其中。比如,张先生有《求真集》专收早年论著,此次整理,则将1949年之前未入集学术论文均附入其中,而以“求真集新编”为书名,书中上编为原《求真集》篇目,下编为附入同时期文章。各类杂著亦依内容及体裁重新分类编排。

三、校勘。在选择底本时,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最初出版的单行本自然是最忠于张先生著述原貌的,然而往往存在一些明显的排印错误,后来经过精校的《文集》《全集》本等又难免对原书有细微改动。因此,我们最终决定,此前已入集作品,基本以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张岱年全集》为工作本,搜集众本详加比勘,并充分利用现存手稿及誊清稿对校,如《天人五论》就使用了家藏1953年誊清稿作为对校本,凡有异文,除旧本存在明显的排印错误外,一依旧本回改,必要之处出校记说明。此前未入集作品则以手稿或最初发表时的版本为底本。并复核书中引文及出处,引文出处标注格式亦在各书内部予以统一。总之,这套增订版《全集》,以呈现张先生著作原貌为基本原则,尊重作者用语习惯,除明显的排印错误、标点与现代规范不符及引文问题外,不妄加改动。

四、编制索引。为便于读者查找,《全集》每书均编制人名、书篇名索引,以音序排列。部分著作另附术语条目索引,如《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

此外,《全集》中各著作版本情况及内容体例不一,整理时根据各书具体情况酌情予以处理。这些工作都写在了各卷之前的《编校说明》中。



在增订版《全集》编辑过程中,张尊超、刘黄二位先生亲力亲为,整理张先生未刊遗稿,并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充分信任及大力支持;同时,我们也有幸得到了学术界,尤其是陈来、杜运辉、李存山、刘笑敢、衷尔钜等诸位先生的中肯建议,以及出版界众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斯人已逝,然哲思不息,于时代洪流中历久弥新。我们期望,能借增订版《全集》出版之机,把张先生的思想更加全面、准确地发扬光大,启人心智,增人智慧。

《稀见明人文话二十种》呈现明代文章学风貌

■侯体健

2007年王水照先生编成《历代文话》十巨册,选录了自宋迄于民国143种文话著作,初步清理了我国古代文话资源,为建设中国古代文章学学科奠定了重要文献基础。近十年来,学界对古代文话及文章学有了持续的关注,出现了一批重要成果,陈广宏、龚宗杰二位先生整理的《稀见明人文话二十种》(下文简称《稀见》)就是这一领域的新创获。

明代的文话著述,《历代文话》选辑了31种,初步展现出明人的文章观念与论文要旨。陈、龚二位先生则广泛调查相关文献,撰成《明文话叙录》一文,勾稽出明人文话126种,其中现存87种,散佚39种,基本摸清了明代文话家底,为我们全面整理明文话打下了坚实基础。在此范围内,作者精心选录20种稀见文话整理出版,向学界揭示了明代文章学著述鲜为大家注意的重要一隅。该书命名“稀见”,所选20种文话允称罕觏之作,其中不乏世间孤本,从海外采入也有多种,如《新锲诸名家前后场肄业精诀》为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汤睡庵太史论定一见能文》为日本前田尊经阁文库藏崇祯刊本,《新刻张太史手授初学文式》为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刻本,《新刻文字谈苑·谈文》为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明刻本,都是颇难寻觅的重要文话。据了解,该书原拟收录22种,最后因有两部文话已收入新出版的文献丛刊中,在清样阶段被剔除,足见编者持律之严,力保“稀见”二字的含金量。

“稀见”固然是该书极重要的一面,但其中所包蕴的学术意义,绝非一般层面的珍稀文献价值而已,更在于它与《历代文话》形成互补,较为全面地呈现出明代文章学总体特点,折射出中国古代文章学史上的重要问题。

《历代文话》秉持“寓选于辑”的指导思想,确立了“着重古文”的收录原则,其中明代部分虽有吴讷、杨慎、归有光、茅坤、屠隆等人的重要之作采入,然较之明代文话整体,仍只是少数,所勾勒的文章学线索也就较为粗略。《稀见》20种的整理,与《历代文话》明代部分互为补充,两书相合已将明文话的多数纳入,展示出明代文章学更为丰富的面相。而且《稀见》将收录原则放宽,特别注意制艺类文话的搜辑,体现出文话在明代的新变,非常符合明代文章学发展的实际。林纾《春觉斋论文·述旨》曾指出:“论文之言,犹诗话也。顾诗话采撷诸家名句,可以杂入交际谈诙;若论古文,非庄论莫可。”所谓“庄论”即指出文话与诗话、词话在著述风格上的区别,这种区别背后实则关乎文章与诗词在价值序列、社会功用与批评路径的不同。古文如此,时文更是如此,科举时文作为明代文章之大宗,自然应当加以特别考虑。

《历代文话》酌收论时文之作,数量较为有限,仅有宋代魏天应《论学绳尺·行文要法》、元代倪士毅《作义要诀》、明代庄元臣《行文须知》、陈龙正《举业素语》等数种代表而已。《稀见》所收科举时文文话,则有十二种之多,占据了绝对优势,如袁黄《举业彀率》、汪时耀《举业要语》、武之望《举业卮言》在标题上即已可辨识性质,凸显出科举时文在明代文章学中的重要地位。一般来说,时文文话在理论品格上要逊于古文文话,但也不尽然,如武之望《举业卮言》(为《稀见》所收《新刻官板举业卮言》的一部分,单行本又有所不同)分内外两篇,内篇标举神、意、气、骨、质、品、才、识、理、意、词、格、机、势、调、法、趣、致、景、采十二目,所论具有文学理论的普适意义;外篇又配以读书、看书、涵养、造诣、法古、师范、铨次、释篇、释股、要语十章,导示读书作文路径,具有指导入门的实践性指向,两篇合观,系统性很强,可谓“形而上”与“形而下”相合,毫不逊色于优秀的古文文话。整体而言,这批时文文话背后所昭示的古代文章学在明代的变化,意义更为重大。自南宋以来,文话著述与科举制度关系日益密切,备考举子对各类文章写作指导用书的需求激增。明初文话尚以古文为探讨中心,自明代中叶开始,时文文话大盛,于是文话中开始大量出现时文与古文的关系话题,“以古文为时文”的讨论风气兴盛,这些著作对唐宋古文理论的一些经典话语和重要命题予以重新思考,从而丰富了文章学整体格局。与此相关,书坊刻书与课堂讲授俨然成为明代文章学风貌的重要塑造力量,文话的世俗化趋向愈为明显,实践性与应用性色彩更加强烈。这从《稀见》所收文话标题中的“新刻”“新锲”“重校”等字眼,以及“名家”“太史”等名头,即可窥见。《稀见》一书中反映出的这些明代文章学“大节目”,都是本领域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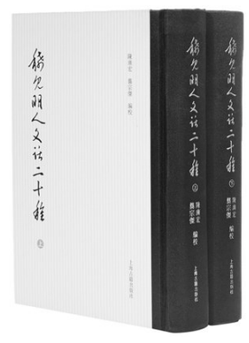
《稀见》所收多种文话均有汇编前人著述的特点,这类汇编式文话在宋代即已出现,到了明代有了重要发展,反映出文学批评著作在文本生成上的新变特色。比如所收王弘诲编《新刻文字谈苑·谈文》二卷,卷一论古文文法乃据《文则》摘录而成;徐渭《重校刻艺林古今文法碎玉集》“古文法”部分亦据《文则》内容,裁以己意,编成纲目,重加排列而成。《历代文话》所收高琦《文章一贯》、朱荃宰《文通》等,亦是此类文话。面对这种汇编重辑的批评著作,如果站在理论原创的立场,自然评价不高。但若转换角度,从前人文论如何被后人接受、改造的角度,从汇编体例的关键词提取与结构逻辑编排角度等,去考虑古代文章批评论著的特性,便会有不同看法。如众所知,诗文作品有集句之体,虽然文句均出自前人,但经过作者重新组合排列却能够产生新的意义。批评论著这种重新剪裁前人论述的做法与之类似,既能体现不同时代话语焦点的转换痕迹,从中也能看出编撰者所持的理论立场,是我们观察文学批评嬗变轨迹的重要视角。明代汇编文话的这种文本特征,到了清代仍在延续,实为我国诗文评著述需要特别注意的本土学术性格,不应被当作简单的抄袭甚或剽窃看待,而应从文本生成和批评观念承变角度,给予更多的观照。这对我们认识明代文章学风貌,乃至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生态,具有启示意义。

《稀见》收录不少汇编式珍稀文话,不仅反映出明代对前代文论的接受状况,也是辑录宋元以来散佚文话的重要资源。我因请准了古委会项目“宋金元散佚文话辑考”,注意搜辑明清文献中保存的散佚文话,《稀见》所收唐之淳《文断》一书就保留了多种散佚文话。如南宋李郢所撰《纬文琐语》,目录不见著录,以前仅可从《退宾录》《学斋佔毕》《困学纪闻》《文章一贯》《荆川稗编》《四友斋丛说》中辑得少数几条,而《文断》保留《纬文琐语》三十六条,绝大部分不见于他书,这对我们认识《纬文琐语》的论文趣向具有特别价值;另外像吕祖谦《丽泽文说》、元好问《诗文自警》等文话也保留了不少条目在此书之中,为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宋金元文话全貌,提供了足资参考的宝贵文献。

以上从时代品格、文本特征和文献价值三方面对《稀见》所收文话提出了一些粗浅看法,最后再说一下该书的前言和体例。

一部大书要有相称的前言才能压得住,《稀见》的前言实则为一篇极有学术含量的明代文话专论,与全书厚重的篇幅交相辉映。该文从辨析“文话”概念的名实问题入手,认为虽然历代以“文话”命名的文章学著述不多,但“文话”与一般的“论文”“文说”传统并无多大出入,可将“文话”作为文章学著述的“标识性指称”,这无疑是颇具识见的通达之论。有学者因命名“文话”的著述较少,便认为当用其他称谓来指称这批文章学著述,而无视“文话”概念的凝练性、包容性与开放性,以及学界使用诗话、词话等相类名词的约定性,不免胶柱鼓瑟,死于句下了。在辨清“文话”概念基础上,前言又论述了明文话收录范围、性质类别、著述特色、学术意义等,可谓一篇明代文话研究纲要,值得认真品读。《稀见》全书的体例,除了遵循古籍整理通则,撰写提要、标点分段外,又对一些特殊情况作了新的调整,在这一点上亦可见出编者眼光。如《作论秘诀心法》据国图明钞本整理,该钞本有不少眉批、夹批,编者在恰当位置标注,以校记形式予以保留,不但较全面地反映出珍本面貌,而且提供了更丰富的评论资料;又如《新刻官板举业卮言》与《重订举业卮言》在内容上既有重复,又有不同,《稀见》将《重订举业卮言》溢出《新刻官板举业卮言》部分辑出附于书末,既节省了篇幅,又保全了资料,让读者对二书的关系有了更全面、直观的认识。这些做法均兼具学理性与实用性。

总之,《稀见》一书作为文话整理领域的新成果,不但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明代文学批评的认识,为我们全面把握明人文章观念提供了新的重要材料,而且也揭示出中国古代文章学鲜为人知的重要面相,必将促进相关研究的深入。



《稀见明人文话二十种》,陈广宏、龚宗杰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3月第一版,198.00元

理想的教育　美好的生活

■郑从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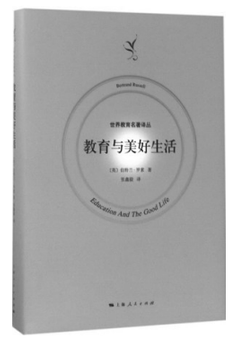
著名作家卢新华在他的《论三本书主义》一文中认为,人要读三本大书,一本是“有字之书”,一本是“无字之书”,一本是“心灵之书”。当合上《教育与美好生活》的那一刹那,我真的觉得一下子完成了“三本书”的阅读。

伯特兰·罗素通过深入浅出的文字,带领读者回到二十世纪初的英国,去体验那个时代属于他自己的教育。他站在家长的角度,结合教育子女的亲身实践,对教育进行深刻反思;他站在教师的角度,践行自己所提倡的教育理念,对教育成败的认识更为透彻;他站在学生的角度,希望采用蒙台梭利等现代教育家摸索出的理论来破旧立新,对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他站在社会的角度,开宗明义地提出“如果一种教育方法不可能普及,我们就无法承认它是令人满意的方法”,对传统的教育理论和英国贵族式的传统教育提出了非常犀利的批评。罗素正是站在家长、教师、学生和社会等角度,对既存教育制度和陈旧观念提出客观且不失公允的批判,同时也颇具建设性意义地提供了改革方案。

罗素提出了现代教育的四大发展趋势:一是教育制度民主化,二是教育内容实用化,三是教育方法自由化,四是给幼儿期以更多的注意。在《教育与美好生活》中,民主可以说是罗素教育思想一条提纲挈领式的原则,因为他呼吁教育改革,就是希望给每一个孩子提供现有的最佳机会,这样才能让孩子在激烈的竞争中适应日新月异的科学进步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实用是教育工具性的体现,“学以致用”在罗素的教育理念中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为了让学生学得精确的知识,罗素一方面从普通教育、专业教育和大学教育三个方面展开了详细而深入的讨论,另一方面也积极鼓励学生需要忍受枯燥并养成理智上的冒险意识。

培养儿童的自律和主动,是罗素推崇自由原则的充分体现。自律绝不是通过恐吓、体罚等形式养成的,而是要借助现代心理学知识,去真正把握孩子的心灵特性。主动学习也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这需要儿童早期确立良好的习惯,并且依靠经验丰富的教师传授真正有价值的知识来开启儿童的学习开关。之所以要给幼儿期以更多的注意,是因为父母的观念是极为重要的,孩子人生的头五年绝大多数的时间和父母在一起,父母真诚地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快乐成长,因而父母的教育力量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若是父母对于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也当作一个将会在世界占据一席的人来尊重,那么这个小孩身上的活力、勇敢、敏锐、和理智四种品性就会越靠近理想状态。

“我们教育的目的是应使心灵充满有直接实际用途的知识,还是应设法将对自身完善有所裨益的精神财富给予我们的学生?”为此,罗素明确提出了个人本位的教育目的。正是基于这样特定目的的写作,读者从罗素的教育思考中获得的是一种理智的、符合逻辑的、客观公正的思想光辉。他反对把国家的强大作为教育的最高目的,而把学生当作实现其目的的工具。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思想,就是放在百年后的今天,依旧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毕竟,接受理想的教育,才能获得美好的生活。



《教育与美好生活》,[英]伯特兰·罗素著,张鑫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5月第一版,40.00元